

台北建城120年系列專文
由台北市文化局贊助

台北摩登：

現代性與愛恨台北

廖咸浩

自從劉銘傳為台灣開始了現代化工作之後，台北就成了台灣接觸摩登的首要管道。但在台灣人既要摩登又拒摩登的過程中，台北因為無法滿足任何一方欲望的全部而遭到了妒恨。然而，台北既不是正港中國，也不是道地西方；不是正港台灣，也不是道地中國。它是一個混雜體，就像任何「現代國家／民族國家」之為混雜體，故台北這樣混雜面貌其實是台灣的縮影，但又比台灣還更台灣——

台北府城今年建城一二〇週年。當時會建城是因為沈葆楨預見台北將成為台灣中心，而今年我們慶祝這個重要的時刻時，台北做為台灣的中心一事，似乎已受到了相當的質疑，更遑論做為華人世界的領航者。是什麼原因讓台北崛起，又何以於今須受如此之待遇？這其中的愛恨喜妒來自何處？

都是因為「摩登」惹的禍

摩登是modern的一種譯法。進入中文之後，摩登卻又發展出了自己的生命，原先的意義仍然清晰可見。它同時涵蓋了兩重意義：現代化與現代風（或現代主義）。前者偏政經，後者則較屬美學範疇；前者毫無疑義的表明對現代生活的肯

定，後者的興起正是肇因於對前者的批判。當這二種意義集於摩登一身時，摩登就比常識性的了解複雜多了。

但追本溯源，摩登起於城市。所謂的現代性始終與城市的發展一體兩面，我們甚至可以說西方的「城市性」(urbanity)就等於現代性。與摩登一詞直接呼應的現代性階段始於工業革命之後，更是西方「城市性」開花結果的時期。故對摩登的愛憎即是對城市性的愛憎。

但對城市的愛憎關係在西方源遠流長，並非始於摩登出現後。在西方城市自古被視為鄉村的反面，並且承擔了負面的象徵意義。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城市被視為罪惡的淵藪，岷末若與索多姆固然是最知名的例子，羅馬也不遑多讓。

十九世紀中葉後，西方的城市因為現代性的城市起源與城市性格，而取得了對



社會資源的絕對主導權，布爾喬亞也成為了新的宰制階級。理論上，城市應能一洗過往的負面意象，但反城市的論述仍再一次出現。先是浪漫主義，後則是十九世紀下半到二十世紀初的新思潮。後者的反城市論述雖然來勢洶洶，卻可視為對現代性的「內部批判」或稱「另類現代性」。

二十世紀初對現代性的批判主要包括了二種型態：馬克斯左翼思考是其一，前衛現代性是其二，但兩者其實都是對另一種「城市性」的追求。馬克斯的摩登希望「克服」初期現代性，以達到整體性的新未來；波特來爾所代表的摩登則是波希米亞式的摩登，是一種在城市中找到另類

台北可以既是「西方」或「過度現代化」的象徵，又是「中國」及「無法現代化」的頑石，究竟何以致之？這樣的轉變牽涉到對於「摩登」的想像及欲望。到底「摩登」是什麼？我們為什麼需要摩登？台北在這個欲望（或事實）中扮演的又是什麼角色？

空間的企圖（如波氏的《惡之華》）。

兩者的策略及意趣似乎完全相反：馬克斯仍將城市跟腐敗與墮落視為一體，而波希米亞現代性則將所謂腐敗與墮落視為城市救贖的所在。前者是宏觀的，後者是微觀的，這兩者都有一定的洞見，若能結合則對現代性將能有較周延的視野。可惜當初二者各行其是，某種意義上也可謂各走極端。

直到二十世紀下葉起，西方才在左翼視野的協助下，重新發現了前衛的意義，也因此逐步對現代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這些新視野不論稱之為「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或「反省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都標舉著一種新的、超越舊有現代性的「進步的現代性」（或「進步摩登」），其中最重要的成分乃是對現代性自身更徹底的批判，但其首要目標反而是把現代性最初的理想找回來。這個理想乃是對人的解放。

但在「後現代性」或「反省現代性」興起前，甚至於興起後許久，第三世界城市的意義仍然過於簡化，常與鄉村在論述上又形成了簡單的對立。原因當然與第三世界接受現代性的時差以及現代性的「外來身分」有密切關係，也與第三世界民族主義興起有關。

台北初次因為負面象徵意義而受到批判的待遇，是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運動期間。當時台北被視為西方及資本主義（即「過度現代化」）在台灣的代表人，頗有成為買辦之都的意味。在這種眼光下，鄉村是「中國」，而台北則是西方，鄉村是純真高尚，而台北則是腐敗墮落（如「鹿港小鎮 vs. 台北」）。到了八〇年代中期

「台灣意識」勃興之後，台北又再一次承擔起負面的象徵意義。這一次，鄉村仍然純真高尚，而台北也依舊是腐敗墮落；但台北已不再是「西方」及「資本主義」（過度現代化）在台的代理人，而是「中國」及其「無法現代化」的頑固殘留。而鄉村因為其「本土」（非中國）之內涵，反而成為「現代化」進步種子的沃土。

台北可以既是「西方」或「過度現代化」的象徵，又是「中國」及「無法現代化」的頑石，究竟何以致之？這樣的轉變牽涉到對於「摩登」的想像及欲望。到底「摩登」是什麼？我們為什麼需要摩登？台北在這個欲望（或事實）中扮演的又是什麼角色？

上述台北經驗中，鄉土文學運動貼近一般的想像，較易理解。粗略的講，鄉土文學運動係在馬克斯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共同觀照下進行，故是反布爾喬亞現代

性的，因此，台北之做為一個現代化城市，特別引起彼此的反感。台灣意識運動與台北的關係則略為複雜，台灣意識運動係以台灣民族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為基礎，自應擁布爾喬亞現代性，故理論上應是擁城市的。何以對台北如此輕賤？原來，台北對台灣意識論者具有雙重的意義：台北原先應是個值得驕傲的城市，因為它曾是由日本人建設起來的、台灣最現代化的城市，但中國政府來了之後，卻把「落伍」的中國文化加諸台北，以致「摩登毀棄、中國雷鳴」，因此台灣意識運動只看到台北的「中國面貌」（但這種面貌到底來自中國或法西斯，或摩登，有待深究）。

一正一反之間，充分顯示了二者對摩登不同的欲望與想像，但摩登並不是單純的欲望對象，而是一個複雜而牽連深廣的現象。但一般對彼此的想像卻來自於自己主觀片面的理解，鄉土文學運動雖反摩登，畢竟其批判性亦是建立在另一種現代性上；而台灣意識運動則因過度擁摩登而不知現代性亦有黑暗面。

摩登終究是可知而不可解，但人人各自言說表述摩登。但也可以說，摩登早已到來，又仍遙不可及。

自從劉銘傳為台灣開始了現代化工作之後，台北就成了台灣接觸摩登的首要管

台北既不是正港中國（哪裡又是？），也不是道地西方（當然沒有）；不是正港台（哪裡又是？），也不是道地中國（當然沒有）。它是一個混雜體（hybrid），就像任何「現代國家／民族國家」之為混雜體。

道。但在台灣人既要摩登又拒摩登的過程中，台北因為無法滿足任何一方欲望的全部而遭到了妒恨。然而，台北既不是正港中國（哪裡又是？），也不是道地西方（當然沒有）；不是正港台（哪裡又是？），也不是道地中國（當然沒有）。它是一個混雜體（hybrid），就像任何「現代國家／民族國家」之為混雜體。故台北這樣混雜面貌其實是台灣的縮影，但又比台灣還更台灣，因為它充分凸顯了台灣的混雜性（hybridity）。然而也因為台北說出了台灣是個混雜物的真相，而在關鍵時刻為中國民族主義及台灣民族主義的想像所不容。只要是在傳統民族國家的想像之下，台北這個與世界接觸最頻繁的城市，就必須是台灣之多餘（excess），甚

至是威脅台灣之整體性的「外來物」。在鄉土文學具中國民族國家的想像裡，台北是汙染源「西方」，而在台灣意識的台灣民族國家的想像中，台北又成了「中國外來政權」。

這樣的作法即是波希米亞所稱的「搶救真實」策略：把台北界定為台灣唯一的混雜之處，彷彿如此便可對台灣的混雜現實，視而不見。同時，台北也是拉岡筆下的一種「小怪物」（objet petit a），它會因為各人欲望之不同而生出各種不同面貌。不同角度的人都認為它與社會主流價值所形成的大系統或「大主人」（the Other）有所扞格，在不知如何處理的情況下，只好把它劃為「化外之地」。實則它的「化外性」根本是大系統想像出來的東西；而大系統（即台灣的「一體性」）本身更是個想像出來的東西。

台灣當前所流行的台灣民族國家論述是擁摩登的，也就是對布爾喬亞現代性採取了無異議全盤接受的態度，於是「受中國汙染」後的台北是不摩登的；另一方面又把在台北所見現代性之弊病歸諸「中國」。換言之，現代性本身是完美無缺的，但中國對彼之接受出了問題。如此，則現代性之未來猶有可期，且須由「無中國包袱之非台北地區」來完成。換言之，

在常識中台北雖為台灣摩登之最，甚至華人摩登之翹楚，卻不為「台灣」所肯定，甚至根本不算摩登。

上述論者是把台北之外的地方視為廣

大的異於「中國」的所在，是立基於它有相當多樣的「異國經驗」——從原住民經荷蘭到日本到後來的美國化。而這種經驗中重要者又被認為是以日本為主帶來的「現代化」（「摩登」）的經驗。然而，姑不論這種異國經驗是否為台北之外才有或更多，較值得注意的是，事實上，這種所謂「多元駁雜」在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文化霸權中卻是無法被接受的；民族國家與多元駁雜是相衝突的語詞。民族國家的欲望是單純的一種命運：順我者昌，逆我者則為全民的公敵。因此，前述「多元駁雜」在台灣民族國家的論述中其

摩登雖與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確有牽連，但這是「負面摩登」的典型。

所以，以偏概全的「台灣性」與「摩登的進步面」

兩者是无法相容的。

實早已被強予融鑄為一種單純的「台灣性」，而台灣性又等於摩登（或是一種曾經發芽過，但因國府來台而夭折的摩登）。

在民族國家（尤其在建國階段）需要內在敵人的狀況下，台北所擁有較台北以外地區更為多元駁雜之文化面貌，遂反而被化約為「非台灣性」（先是「西方」後是「中國性」）。台北是在這種思維之下，被想像成了「非台灣」及「非摩登」，兩者二而為一。

然而，摩登雖與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確有牽連，但這是「負面摩登」的典型。所以，以偏概全的「台灣性」（或「中國性」）與「摩登的進步面」兩者是無法相容的。因此談摩登，必須要先拆除以偏概全之台灣國族（或中國國族）的論述。撇除了對摩登片面的解釋，才能誠懇的接受多元駁雜，才能進一步談論「進步摩登」。

台北摩登嗎？

若說台北在台灣最摩登，從當前常識性的角度看，應無人會否認。從物質現代化或所謂「國際化」的程度而言，台北的確摩登，而且台北這方面的摩登並非始自今日，也不是日據之後才有的事。從一百二十年前起，台北就因為沈葆楨與劉銘傳

等開拓者的努力與遠見，而在摩登方面領先了不只是全台灣，甚至於全中國（也許除了上海）也無人能出其右。沈葆楨的高瞻遠矚使台北躍上了歷史的舞台，而劉銘傳則以台北為核心全面展開台灣現代化的工作。

劉銘傳的功績中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當是建鐵路。一八八七年劉銘傳上奏〈擬興修台灣鐵路摺〉：「一、便於海防，因台灣為海上重鎮，乃東南各省安危之所繫，欲保東南安全，首要確保台灣；欲從事建設，更需先築鐵路。二、便於建省，建築鐵路與興建省城，必須密切配合。鐵路開通，則商業可致繁盛。三、便於工事，台灣自北而南八百餘華里，步行需十三、十四日，而且溪流廣漠，港灣分歧，每逢大水即阻遇不通。要建設台灣，必須發展省內陸上交通以增加運輸效率，然鐵路橋樑之架設，即是一勞永逸之大計。」劉銘傳的建議得到清廷重臣醇親王奕譞及李鴻章等人的大力支持，並在一八八七年動工，開闢了中國第一條官辦且運客的鐵路。

但劉銘傳在台灣之現代化工作中，居中國第一者還不只鐵路一項。全中國最早架設電報的地區也在台灣。一八七七年，兼管台灣的福建巡撫丁日昌已經開了台南

府城到安平和旗後（高雄）兩條電報線。劉銘傳接任後，先完成基隆、淡水到台北之間的電報線，之後又在短短兩個月內完成工程浩大的台北經淡水到福州的電報線。並且在兩年內，以台北的電報總局為中心，將電報線從南到北普遍聯結，當時主要城市如嘉義、台南、彰化、新竹、台北、基隆都已設有電報局。

一八八五年，劉銘傳在方竣工的台北新衙門及各主要街道裝設了電燈，亦是中國數一數二的現代化創設，時程上雖比上海（及倫敦、紐約）晚三年，卻比東京仍早兩年。為配合電力的需求，也完成了全中國第一個自辦的電力公司。

此外，劉銘傳還設立全台郵政系統，興辦電報學堂及西式學堂，開始公共給水設施，建設現代化醫院，還設機器局，自製槍砲。在振興商業方面，劉銘傳也不遑多讓：重要政策如重振樟腦、製茶及硫磺業，鼓勵機器製糖；除加強生產外也加強外貿。一八八六年六月劉銘傳設商務局以利對外貿易，更於新加坡設通商局，並訂購斯美、駕時等兩艘輪船，航行於台灣、澎湖、上海、香港、新加坡、西貢、呂宋等地，使台灣對外貿易持續成長。在乙未割讓日本之前，台灣已是中國現代化最進步的省份，而日人據台之初也仍然是以劉銘

在現代性的發展上，對於現代性的內部批判乃是摩登漸趨成熟的關鍵。但真正的摩登需有對現代性產生批判的視角，才能充分展現摩登的潛能，也才能知道如何對現代性取捨。換言之，摩登是一種對於離散力量與離散必要的高度自覺。

傳之現代化計畫為藍本繼續推動現代化。

以上的諸多現代化工作大多是以台北為中心所進行，台北也進一步成為台灣甚至中國的摩登之首。

可以更摩登

但摩登並不只是物質建設，而且劉銘傳所奠基的台北摩登並非徒有物質的摩登。在日後的發展中，論述摩登或思維摩登也接踵而至（即所謂新思潮的引進）。台灣的整個新文化運動即是從台北開始的，台北對西方現代性的接收同時透過中國與日本。中國的康梁變法到辛亥革命都

受到台北密切的注意，白話文運動在中國發生後未久，便出現在台北，而台北對白話本質的探討又勝過當時大陸的白話文運動（雖然其基本動力仍不脫民族主義想像）。而文化協會、民衆黨等成立以後，同時進行文化的啓蒙運動，包括了舊俗改革、族群平等、女性平權、勞工權益等的文化現代化企圖。可謂現代性的重要價值皆獲探討，並且一定程度開始了對現代性的內部批判。

在現代性的發展上，對於現代性的內部批判乃是摩登漸趨成熟的關鍵。在此之前西方的現代性是天真樂觀甚至傲慢的，但真正的摩登需有對現代性產生批判的視角，也就是，自以為已經雄霸天下的布爾喬亞現代性必須遭到拆解，才能充分區隔摩登的良莠，展現摩登的潛能，也才能知道如何對現代性取捨。換言之，摩登是一種對於離散力量與離散必要的高度自覺。

日據時期對現代性的批判主要是從民族主義及左翼角度展開。在極艱困的殖民情況下，台北也一點一滴的進行另類摩登的發展。做為殖民地的現代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本身既是對現代性的積極吸收，也同時是對「殖民性」(coloniality)的檢討。

如前述，這裡對殖民性的批判並不涉及對現代性的全面反省（雖說，在西方對

現代性之反省，不到後現代時期，也仍不全面），因為，殖民地從一開始就必須透過民族主義的濾鏡來理解現代性。民族主義對現代化有根本上的欲望，但現代性主要又常來自殖民者。於是便會產生第一個疑問，那就是，現代性是否等同於殖民性？如果接受現代性，是否也應反殖民，若反殖民，是否也需反現代性？但在殖民地，對現代性的反省必然會透過對「殖民性」的反省而來，故對現代性的黑暗面自有其透視能力，也因此城市爭奪戰就不會如西方的單純而直率。在西方，反現代性是一種自省的工作，但殖民地對現代性的欲望，又會把上述這種透視能力加以框限，並將其黑暗面歸諸某些扭曲現代性的外緣因素，並且再度回到一統的肯定現代性的論述中。故在殖民統治下以波希米亞的離散方式，尋找城市另類空間的工作無法展開也是自然的。

但在擺脫殖民統治後，前衛馴化後變成的現代主義雖有較多機會，但第三世界建國未成的民族主義宿命感（即，因為趕上西方而產生的焦慮），則必然會動員國族主義對其質疑。不論是形式取向的，或是前衛取向的現代主義。而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對批判現代性的吸收，又常將之當做是布爾喬亞現代性的一部分（包括當代

台灣的Spring Scream等文化現象），所以前衛常不太前衛，反而成了布爾喬亞打壓本土傳統的急先鋒。

多元的摩登

幸而在現代性的不斷洗禮之後，台北對於這種宿命也漸有認識，雖然並不普遍，畢竟是走在華人世界的最前方。台北戰後現代性的發展逐漸把現代性的意義做了正確的開展，也就是後期現代性對早期現代性的反省。隨文藝復興出現的現代性原是爲了人的解放，但其發展過程卻窄化了人的意義，直到歐洲霸權的衰落，才有新的思維出現，再次找回解放「人」的可能性；現代性真正可貴處在於爲人打開的可能性是「多元」。

然而，台北爲何被妒恨？卻正是因爲它的多元。曾因爲「不中」而遭鄉土文學批判，又因「不西」而爲台灣意識論所批

仔細檢視西方現代性的海洋行徑便知，掠奪與破壞是主調，今天西方世界的駁雜與多元，多是殖民過程中不可抗力的副產品。

判。但基本上都是因爲它的多元駁雜，踩到了國族主義論者的痛腳，把「民族國家之不可能」（the impossibility of the nation-state）以最具體的方式表達出來，但多元卻又是台北的生命力之所在，是台北摩登的特色。

多元何以會是台北摩登的特色？其實這個問題也就是在問「摩登與多元的關係爲何」？更根本的問題則是，城市自己是否能夠成爲超越自己的力量？如何從布爾喬亞現代性的根據地，變成進步現代性的樂園？

以往我們在談現代性時，一味的強調它的開創與拓殖，過去一、二十年來兩岸不約而同所談到的海洋文化皆以此爲基礎，其實這種對現代性的詮釋極缺反省能力。的確，十五到十九世紀以來的現代性，確是以海洋拓殖著稱，但它雖可以帶來多元與創新，卻更可以縱情於掠奪與破壞。仔細檢視西方現代性的海洋行徑（也就是衆所周知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便知，掠奪與破壞是主調，今天西方世界的駁雜與多元，多是殖民過程中不可抗力的副產品。

但台北摩登與西方現代性之不同在於，它有獨樹一幟的在地特色，這種獨特的摩登始於沈葆楨、劉銘傳，在他們的手

中，台灣開始吸收西方的現代性，其外貿與洋務等方面的奠基，展開了台北多元、創新與混雜的未來。但劉銘傳所奠基的台北摩登的掠奪性與破壞性，卻遠不如西方，而這方面反倒是因為承繼了中土溫柔敦厚的傳統文化。傳統文化雖然在面對現代性最初的衝擊時，顯得左支右絀，甚至時有保守之回應，也不用諱言。但傳統文化對人與自然的尊重，也有現代性所難以企及而應予學習者。比如，即使清代漢人政權對台灣原住民而言是殖民政府，但其殖民政策就迥異於西方的殖民，甚至西方知名學者還稱之為「反殖民式殖民」(anti-colonialist colonialism)，政策也常從保護原住民權益出發。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台北所展開的現代性是相當包容而進步的，而且一直到今天這個傳統仍然持續不墜。

台北新摩登

現代性始於城市，甚至我們可以說城市性就等於現代性。但從二十世紀末開始，城市也成了反省現代性的基地。城市塑造了現代國家，但也為現代國家所局

摩登有二重意義：
現代化及批判性現代性，
前者誇大及擴張人的力量，
後者追求人的合理地位。

限，如此的城市的宿命，在今天或有可能改變，而改變也來自城市本身。因為在全球化的局面下，城市開始有機會超越來自國家的國族主義要求，而成為進步摩登的新動力。這種新摩登會比過去的反城市論述都要返祖，但又是最進步的現代性。

如前述，摩登有二重意義：現代化（布爾喬亞現代性）及批判性現代性（左翼及波希米亞現代性），前者誇大及擴張人的力量，後者追求人的合理地位。但在前者當道百年以上的狀況下，已造成了全球的文化及生態莫大的傷害，城市的發展過程中所呈現的文化與生態危機，便具體而微的反映了這個全面的危機。批判城市的論述如能正確掌握現代性的缺失所在，開發現代性的正面潛能，則反城市論述與城市反而是相輔相成的。因此談摩登，就

必須談「後摩登」，而「後摩登」最重要的意義之一，應是如何從在地文化的傳統中找到批判摩登、補救摩登的力量。

因此，台北在建城一二〇年之際，我們應做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召喚城牆」，也就是，把城牆的一般性象徵意義（即傳統文化），從早期現代性偏見的遮蔽中解放，彰顯傳統文化在當代的救贖意義。另一方面，則是要把台北城牆獨特的象徵性意義——傳統大陸文化與西方現代性適恰的結合——還其本來面貌，讓台北市民（乃至全台住民）都能重新認識台北文化從一百二十年前即已建立起來的在地海洋文化傳承。這個傳承同時兼有傳統大陸文化與西方海洋文化的優點，既有扎根本土的深度又有面向世界的視野，既能尊重歷史又勇於創新，既知溫柔敦厚又能開拓冒險，既有愛也有夢想。

在當前民粹氣氛高漲的情況下，台灣正處在一個轉捩點上。它能否成為一個真正能愛有夢的美麗之島，或將在內耗中自廢武功，端看它是否能正視以台北為首所建立的海洋文化傳承——台北摩登。如此，則台北怎麼能不深自期許，帶頭引導台灣走回傳統找到溫厚與給養，走進海洋發現寬廣與新機？（作者為台北市文化局局長）